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吴 琦 主编

# 明代“问题皇帝”研究

——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

MINGDAI WENTI HUANGDI YANJIU  
· Yixiang Jiyu Shehui Leiqun De Kaocha

吴 琦 赵秀丽 著

# 明 清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吴 琦 主编

# 明代“问题皇帝”研究

——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

MINGDAI WENTI HUANGDI YANJIU  
Yixiang Jiyu Shehui Leiqun De Kaocha

吴 琦 赵秀丽 著

#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吴琦，  
赵秀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

ISBN 978 - 7 - 5161 - 5623 - 0

I. ①明… II. ①吴… ②赵… III. ①皇帝—人物研究—中国—  
明代 IV. ①K827.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029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户小平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王海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19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绪 论/1

- 一 研究缘起/1
- 二 学术前史/2
- 三 关于“社会类群”/16
- 四 角色理论与皇帝规范/16
- 五 研究思路与框架/23

## 第一章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征/27

- 第一节 明代皇帝的趋向性特征/27
  - 一 政治低能化/28
  - 二 行为个性化/31
  - 三 平民化趋向/36
- 第二节 明代“问题皇帝”及其表征/45
  - 一 皇帝分类及划分标准/45
  - 二 明代皇帝执政群像图/48
  - 三 “问题皇帝”的共性特征/55

## 第二章 储君生存环境的险恶/62

- 第一节 父皇漠视与疑忌/62
  - 一 皇帝限制储权打击皇储/62
  - 二 皇帝助推皇子争宠/65
  - 三 父子之情缺失/66
- 第二节 生母失宠 无力护佑/71
  - 一 后权式微，废后频繁/71
  - 二 太子生母势单力薄/77

三 宠妃恃宠争权，迫害太子/79

第三节 人格畸变/84

一 父子交恶/85

二 性格软弱多疑/87

三 极度压抑导致心理疾病/92

**第三章 皇位继承制度的负面效应/98**

第一节 明代的皇位继承及其特征/98

一 明代皇位继承情况/98

二 超稳定性特征/100

第二节 皇位继承超稳定性的潜在危害/103

一 皇储才能素质低下/103

二 皇储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104

三 皇储忽视修炼君德/106

第三节 皇帝寿龄特征及其影响/108

一 明代皇帝的寿命/108

二 英年早逝对皇帝身心的影响/113

三 短寿对王朝政治的负面影响/117

**第四章 教育与祖训规制失效/122**

第一节 皇帝储君教育的缺失/122

一 皇储教育的制度缺陷/124

二 明代讲官教导之误/132

三 实际学习情况及效果/144

第二节 皇帝对于祖训规制的逆反/151

一 繁琐祖训对皇帝的束缚/153

二 不立宰相的祖制助长皇帝荒政怠政/161

**第五章 皇权制约机制低效/168**

第一节 完备的监察体系与有限的监察效率/168

一 监察部门缺乏对皇帝的逆向监督/169

二 制度缺位/172

三 监察官员屈从皇帝意志，改节变志/173

**第二节 悖论：成熟文官制度的缺失/176**

- 一 文官制度对皇帝的束缚/177
- 二 文官制度助推“问题皇帝”的生成/182

**第六章 臣属之误/193****第一节 官员之误/193**

- 一 官员倨傲劝谏，致皇帝不满抵触/193
- 二 大臣唯唯诺诺，致使皇帝失望消沉/198
- 三 官员舍本求末，致皇帝厌烦疏离/200
- 四 大臣顽固教条，致皇帝逆反排拒/204
- 五 臣属对皇帝之包容，纵恶行/207

**第二节 宦官近侍之误/215**

- 一 宦官弄权/216
- 二 近侍之惑/228

**第七章 “问题皇帝”与王朝命运/230****第一节 急政与王朝行政效率的低下/231**

- 一 “问题皇帝”长年荒政急政/231
- 二 皇帝选官不当，缺官不补/234
- 三 皇帝不作为致文官集团因循守旧/237

**第二节 家国利益与一己之私的倒置/243**

- 一 财政危机不改奢靡之风/243
- 二 侵夺国库，充实内库/244
- 三 搜刮民脂民膏/246

**第八章 “问题皇帝”与政风、士风的转变/253****第一节 官员：改节、无为、颓废、党争/253**

- 一 皇帝以个人好恶选用臣属，致官员曲意奉上/253
- 二 皇帝打击报复犯颜直谏者，致官员不敢任事/256
- 三 皇帝改变言路风格，造成言官蜕变/260
- 四 官员转向“逐利”/263
- 五 明廷朋党之争/266

**第二节 士人：隐逸、适意、谈禅、怪诞/273**

- 一 绝意仕途/275
- 二 归隐山林/278
- 三 修禅习道，清谈风盛/281
- 四 尚奇慕异，狂狷怪诞/286

## 第九章 “问题皇帝”与社会大众生活的互动/294

- 第一节 导淫/295
  - 一 皇帝恣情纵欲/295
  - 二 皇戚官员渔色成风/298
  - 三 民间淫风盛行/301
- 第二节 逐利/304
  - 一 皇帝聚敛财富/304
  - 二 官员求财敛财/305
  - 三 百姓逐利好伪之风盛行/306
- 第三节 导奢/309
  - 一 皇帝生活奢靡/310
  - 二 民间奢靡僭越成风/311
  - 三 社会风气的恶化/316
- 第四节 引领服饰时尚/319
  - 一 服饰规制与民众认同/319
  - 二 皇帝“效应”引领服饰风尚/322
  - 三 皇宫与民间服饰的交流与呼应/325

## 第十章 明代皇帝与文学艺术/330

- 第一节 皇帝与戏曲、小说/330
  - 一 皇帝好戏/331
  - 二 皇帝喜读通俗小说/337
  - 三 皇帝喜好对市民文化的影响/338
- 第二节 皇帝与瓷、画艺术/346
  - 一 统治风格与瓷器风格/346
  - 二 皇帝对书画的影响/349
- 第三节 皇帝与公众舆论的互动/351
  - 一 皇帝的无为助推公共舆论趋向自由/351

---

二 邱报讹言传播迅速/355
三 皇帝对文化思潮的影响/356
结语/361
附录一 明代后妃情况一览/373
附录二 明代重要后妃的相关资料/375
附录三 明代皇子寿命情况/378
参考文献/381
后记/388

# 绪 论

## 一 研究缘起

梁启超曾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sup>①</sup>。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力核心，皇帝及与其相伴相生的皇权专制主义制度，备受古今学人的关注。无论是微观的皇帝个案研究，还是宏观的皇帝制度、皇权主义研究，成果都很丰硕。历朝历代的皇帝统治，既呈现出相似的兴亡发展历程，又呈现出各自时代、阶段与个性特色。秦朝秦始皇的统一建制、二世而亡的悲剧命运，与隋朝隋文帝的大一统繁荣盛况、隋炀帝杨广暴政导致王朝倾颓，颇有相似之处。而汉朝、唐朝与明朝的宦官专政、党锢之争在导致王朝灭亡中又呈现惊人的相似。然而，深入比较、剖析这些王朝，不难发现彼此之间的鲜明差异。

之所以关注明代皇帝，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一是明代是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时间近三百年之久，充分体现了一个王朝由兴建、发展、繁荣、衰弱、中兴、败亡的发展演进历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二是明代十六帝<sup>②</sup>既有少年天子，又有长寿皇帝。皇帝个体生命形态、个性特征与王朝政治、兴衰存亡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类群当为深入认识和理解明代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有效视点。

三是明代作为汉族皇帝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处于皇权高度集中、官僚制度发展成熟的阶段，又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其间包含着大量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

<sup>①</sup>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岳麓书社1998年版。

<sup>②</sup> 明代十六帝分别为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和思宗朱由检。

四是明代的皇帝颇具群体特征，多数皇帝在出身经历、成长过程、个性心理、执政状态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在历代王朝中独具特性，何以如此？其中涉及的问题颇具学术意义。

与以前传记形式的成果以及政治制度史研究不同，本书对皇帝的研究既关注皇帝个体间的差异，又注重皇帝与文官集团、宦官集团、士绅阶层、普通民众的交往互动；既关注皇帝的政治作为，又注重皇帝对社会风气、大众舆论、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笔者怀着对明代“问题皇帝”及围绕“问题皇帝”浮现的一系列问题与现象的浓厚兴趣，在接触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真切地勾勒明代皇帝群像图。希望借“角色理论”和“互动理论”，通过对“皇帝”角色的解构与剖析，着重分析明代中后期的“问题皇帝”，找出导致皇帝“自我”与“本我”脱节、皇帝角色冲突与失败的原因，深入认识皇帝对王朝政治、官员土人与普通民众造成的影响，从而把握皇帝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对明代皇帝的群体性考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对于中国皇帝尤其是明代皇帝，有不少问题值得深思：在明代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明代皇帝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明中后期皇帝都不称职？为什么在皇帝出现“角色失范”的情况下，明代社会反而出现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繁荣、江南地区的盛世景观？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所体现出的个体对自身角色的叛离，是否与当时社会盛极一时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思潮遥相呼应？“问题皇帝”在明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社会变迁（尤其是士人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学者所谓的“高度发达的文官体制”？如何评价皇帝个人的感性认识与制度规范的理性制约？到底是权力统制理性，还是理性约束权力？

## 二 学术前史

明代文献中，除了正史、政令、奏折、文书等<sup>①</sup>记载了大量皇帝的言行与政务活动外，还有诸如明清笔记、文集、杂谈、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类文献记载了他们的轶闻趣事，共同展示了皇帝鲜为人知的丰富多彩的一面。这些文献的记载既是史料，也都带有对于皇帝的倾向性评价。总体而言，有明一代，时人交口称道的皇帝寥寥可数，仅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数人而已；其他如惠帝、景帝、宪宗、光宗在位期间多得大臣拥护，抨击相对较少；而英宗、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思宗则备受官员、臣民与后人抨击，责难之声

<sup>①</sup> 诸如《明史》、《明实录》、《宝训》、《明会典》、《明会要》、《明通鉴》、《明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朝纪录汇编》、《皇明诏令》、《皇明大训》、《皇明史概》、《皇明世法录》等。

不绝于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总结明代政治得失时，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帝有了全新的认识，提出“非君”与“抑君”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非君”思想推向顶峰。

代表人物黄宗羲回顾了君道发展、演进的历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sup>①</sup>他视天子为“独夫”、“寇仇”，猛烈抨击君主“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君主）一人之淫乐”的行径；并质疑天子的绝对权威，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sup>②</sup>；鼓励人们以是非曲直为判断尺度，不盲目迷信皇权，对口衔天宪的皇帝无须言听计从、顶礼膜拜，要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

顾炎武第一次明确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别开来，纠正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国不分、家国同构的观念。他指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sup>③</sup>认为亡国只是改朝换代，事关君主和政府官员的变更，属于肉食者谋之的范畴；而仁义败坏、道德沦丧事关天下苍生的兴亡，因而百姓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不可能超出传统专制统治的樊篱。他们对皇帝个人或制度的批判，并不表示否定专制皇权本身。他们提出的各种限制、约束皇帝言行的“抑尊”说、“权力制衡”说，都是为了纠正现行专制体系中个体皇帝偏离皇帝规范与义务、失德败政的行为，恢复或实现理想的圣王之治，期待最高统治者成为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并彻底击碎中国人“天朝上国”的心结。血泪与苦难催人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竭力批评皇帝个体偏离皇帝角色规范的失当之举，纷纷建言献策，努力帮助统治者摆脱困境。然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的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改良方案纷纷以失败而告终。先行者们逐渐意识到皇帝和皇权专制主义制度才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谭嗣同在《仁学》中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2《原君》，《黄宗羲全集》（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4《学校》，《黄宗羲全集》（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sup>①</sup> 维新派认为，中国只有改变专制主义政体，冲破一切网罗的束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派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激烈的革命方式摧毁顽固不化的专制制度，用武装暴力推翻中国延续千年的皇帝专制统治。邹容在《革命军》中高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猛烈批判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认为“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sup>②</sup> 革命派辑录的类似反清革命文集还有很多。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指清政府，深入批判君主专制，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旋律的近代中国，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对专制主义皇权制度和皇帝多持批判否定态度，对明代皇帝概莫能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界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对皇帝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出版关于朱元璋的专著，对朱元璋的评价持辩证态度，认为朱元璋剪除群雄，建立新王朝，一方面恢复旧秩序，践行程朱理学，打下百年基业，功劳显赫；另一方面他叛变起义初衷，作为封建统治者，不但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sup>③</sup> 但毛泽东强调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吴晗违心四易其稿，最终将朱元璋定为农民阶级的杰出造反者。明朝建国史，也就是一部农民阶级起义反抗压迫与剥削的赞美史诗。除此之外，其他皇帝诸如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等被视为封建统治阶级荒淫皇帝的典型、人民的公敌，遭到猛烈批判、否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明代皇帝的研究多持否定

<sup>①</sup> 谭嗣同：《仁学·自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②</sup>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71年版。

<sup>③</sup> 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批判态度，评价有失公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渐挣脱既往研究的樊篱，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科学地定位和评价明代诸帝。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关于万历皇帝的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黄氏对于大家极为熟悉且认识基本定型、人物基本模式化的万历皇帝，给予同情与理解，揭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崭新形象和生活面貌，让我们体悟到皇帝之为皇帝的悲哀与无奈的一面，从而掀起重新研究皇帝的热潮。人民出版社主持的大型丛书“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中关于明代皇帝的有《朱元璋传》、《明成祖传》、《万历传》和《崇祯传》四部<sup>①</sup>；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明代帝王系列传记”，包括《洪武皇帝大传》、《永乐皇帝大传》、《宣德皇帝大传》、《正统皇帝大传》、《弘治皇帝大传》、《正德皇帝大传》、《嘉靖皇帝大传》、《万历皇帝大传》、《天启皇帝大传》、《崇祯皇帝大传》等<sup>②</sup>；其他著作还有郭良玉的《朱元璋外传》，陈梧桐的《朱元璋研究》，修晓波、田澍合著的《明太祖——朱元璋》，商传的《永乐皇帝》，何宝善的《嘉靖皇帝朱厚熜》，许大龄、王天有的《明朝十六帝》；等等。<sup>③</sup>这些专著在丰厚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分别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时代、政治背景进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每位帝王传奇的一生。皇帝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异彩纷呈。

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两大趋势：

其一对昔日被批判和否定的明代皇帝进行重新定位，将其功过是非客观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充分认识人物的复杂性，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不公正评价。

<sup>①</sup>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sup>②</sup> 呂景琳：《洪武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赵毅、罗冬阳：《正统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曹国庆：《万历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德信、譚天星：《崇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③</sup> 郭良玉：《朱元璋外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梧桐：《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修晓波、田澍：《明太祖——朱元璋》（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何宝善：《嘉靖皇帝朱厚熜》（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许大龄、王天有：《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例如，樊树志在《万历传》中认为，“神宗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使自己从青年时代就疾病缠身，想躬行亲政又苦于力不从心；他宠幸郑贵妃，进而因为国本之争与廷臣隔离。他的尚气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他又担忧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sup>①</sup>。樊先生同时认为，穆宗虽是一个平庸的、刚德内用、柔道外理型的帝王。对于宫闱掖庭极为严格，“周防慎察，无敢出声”，而临朝理政，与大臣接触，则施以宽仁柔道，“臣庶廷谒，小不如仪，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未尝清降词色”。<sup>②</sup>

林延清认为，世宗既有一些有利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也有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方面。他是一个较难作出准确评价的皇帝，可以说既不是英主，也不是昏君，如果用中材之主来评价还是比较合适。给他打分，只能是五五开了。<sup>③</sup>

林金树、高寿仙认为，熹宗本性还是善良的，只是性格懦弱、缺乏主见，跟正人即行正事，遇邪人则为群小所用，惜其终被奸人利用。虽然无心杀人，却残害大量忠贤之士，最后连后妃妻儿都不得保全，被钉在昏聩之君的耻辱柱上。<sup>④</sup>

其二，将皇帝从圣坛上拉下，还原为一个平凡人。从背面、侧面多方位进行审视，将皇帝的象征符号与实际个体分离，将皇权主体与皇权制度分离，充分挖掘时代背景、制度因素与皇帝个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李洵认为，武宗是不适合当皇帝却被推上皇位宝座的无道之君。其悲剧不仅是本人造成的，也是他所从属的贵族阶层造成的。武宗是被明代贵族推上祭坛作为皇权统治之下所有罪恶的牺牲品孤独死去的。<sup>⑤</sup>从而将明朝在正德年间的转折视为武宗和统治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避免将所有过失推诿、强加于武宗一人身上。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侧重分析在规范与制度束缚下贵为一国之君的万历皇帝的郁郁寡欢，表达了人们对皇帝这一政治体制束缚下痛苦无奈的

<sup>①</sup>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3、14页。

<sup>③</sup> 林延清：《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sup>④</sup> 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⑤</sup> 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灵魂的同情与理解。<sup>①</sup> 黄氏以小见大，通过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将帅戚继光、思想家李贽等人的遭遇，说明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的出现断非个人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sup>②</sup>

林金树、高寿仙在《天启皇帝大传》中刻画了熹宗这个短命皇帝一生贪玩、怪癖、厌倦朝政的特殊性格，描绘了魏忠贤专权下的明朝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sup>③</sup> 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熹宗个人的身世、素质、个体行为和他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以及魏忠贤的专权分别进行客观分析。既批判其昏聩的一面，又同情他处于时艰下的不幸遭遇。

这些专著将皇帝个体纳入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尽量避免单纯地让皇帝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与罪过。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促成的。传统观念里备受责骂的皇帝如武宗、神宗、熹宗等，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产物，时势所致；再加上其自身存在的性格或心理缺陷，失败遂不可避免。这种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于皇帝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此外，关于明代守成之君的研究也不乏新意。例如，在明代历史上颇受推崇的宣宗和他的父亲仁宗被史家比拟为周朝的成、康，汉代的文、景。赵中男在《宣德皇帝大传》中指出，朱瞻基能取得如此功绩，关键是生活的时代背景好；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开拓性工作在太祖与成祖手中已经完成，内阁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巡抚制度、监察制度良性运作。朱瞻基是游乐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倚仗群臣正确决断，使得大明王朝飞速发展，从而出现“仁宣之治”的盛况。朱瞻基的成功既有个人因素，更与王朝发展规律、所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从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宣宗，避免了人物传记过分夸大的缺点。<sup>④</sup>

赵中男在分析成祖朱棣与太子朱高炽的关系时别出心裁，认为成祖对太子

<sup>①</sup> 万历的懒惰乃是极度苦闷的象征，张居正不让他练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群臣不让他立宠妃的儿子为太子，千方百计将之束缚在祖训制度规范中。他在免去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的同时，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只是活着的祖宗。明明是一个喜欢活动而又精力充沛的人，但又无法做出积极的创造。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9页。

<sup>②</sup>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sup>③</sup> 林金树、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④</sup> 赵中男：《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

的打击不是因为厌恶太子、宠爱次子而生废立之心。关键在于太子长期监国，权力重心发生转移，无形中对朱棣造成威胁，使雄猜专断、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他一方面对太子采取限制防范措施，不断打击和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有意纵容和优待高煦，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和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sup>①</sup> 可以说，成祖并不是想废太子，而是要削弱和限制储权，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郭厚安在《弘治皇帝大传》中，根据孝宗一生的行事以及当时的现实，认为他是一个缺乏雄才大略的平庸之辈，一个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的“中主”。作者充分挖掘孝宗的思想与性格特征，认为这是理解孝宗行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孝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恪守“敬天法祖”、“尊尊亲亲”的古训，致使他很难清算父皇宪宗的过错而改弦易辙，很难冲破外戚、宗室的包围，于是放任、庇护他们的所作所为；他在迷信神仙佛老的氛围中成长，因而很快便走上其父深居宫中、修斋建醮、妄求长生的老路。此外，郭厚安还指出，孝宗虽然对臣子比较宽容温和，但骨子里以自我为中心，不信任大臣，只信任宦官与近幸。<sup>②</sup>

除了这些专著外，近三十年来，关于明代皇帝的论文数以千计。其中近半数的文章都聚焦在明太祖身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明朝建国历程及政治法律思想探析。通过对《明大诰》等文本内容进行研究，评析“以猛治国”、“重典治国”的功效。<sup>③</sup> 例如，刘潇潇从立法、执法和普法的角度审视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思想，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适时立法，修订重典，用重典治乱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合乎形势变迁的立法机制；严于执法，官吏犯法与庶民同罪，取消官吏特权，合乎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明令律典条文家藏人诵，力求老幼皆知，把全民普法工作落到实处。因而对当今依法治国、惩贪反腐、普法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sup>④</sup>

徐晓庄指出，朱元璋在其法律实践中，一方面重视法律条文的修订，进行

<sup>①</sup>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②</sup> 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③</sup> 此类文章非常多，可以参见姜晓萍《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朱玉婷《朱元璋法律思想探析》，《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王世谊、丁守卫《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等。

<sup>④</sup> 刘潇潇：《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合理性及历史借鉴》，《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普法宣传，带头秉公执法；另一方面却自坏律条，设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锦衣卫，颁布法外之法《大诰》，法外用刑、以情屈法，使言与行自相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朱元璋自卑多疑、雄猜好杀，又倔强刚猛、专蛮暴横的个性是内在因素；第二，明初吏治的败坏造成社会混乱是外在社会因素；第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的一贯主张是导致他法律实践矛盾的历史原因。<sup>①</sup>

张生在《略论朱元璋犯罪预防思想》中归纳朱元璋的预防犯罪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明礼导民——用儒家纲常名教、礼仪规范教化、约束臣民”、“以法为教——使臣民熟知法律、趋吉避凶”和“明刑辅教——以残酷的刑罚警戒臣民以期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明太祖预防犯罪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密切相关：正统儒家导民以德、齐民以礼的思想已无法适应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无法缓和阶级矛盾，难以起到禁恶于未萌的社会效果。朱元璋不得不在强调“明礼导民”的同时，更注重贯彻法家功利主义思想；不厌其烦宣讲法律来教育百姓，用不嫌其重的刑罚来震悚百姓。“从朱元璋预防犯罪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法律思想已开始发生裂变，统治者更多地采用法与刑的手段来预防犯罪，加强专制统治。”<sup>②</sup>

其二，整饬吏治、严惩贪官、肃贪倡廉、重典治吏的举措及其功效。这类文章通过研究明初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奖惩措施及实践活动，思考今日之廉政建设问题，充分体现了历史借古鉴今的功能，为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提供积极的指导作用，为今日社会弊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借鉴。<sup>③</sup>

何成认为，朱元璋的反贪举措主要包括：加强立法，重法惩贪；重视普法；强化监督；加强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奖励举报，表彰廉吏；完善财政制度；提高各级官吏的俸禄以养廉。朱元璋反贪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

① 徐晓庄：《试析朱元璋法律实践的矛盾性》，《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② 张生：《略论朱元璋犯罪预防思想》，《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③ 例如，赵映林：《朱元璋整饬吏教训》，《文史杂志》1992年第6期；王世谊：《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赵天宝：《论朱元璋“重典治贪吏”及启示》，《兰州学刊》2007年第6期；王明坤：《浅论朱元璋重惩贪赃罪之严厉性及效果》，《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1期。王起奎：《朱元璋治吏禁贪及其启示》，《政工学刊》1994年第1期；李风华：《简论朱元璋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与明代政治兴衰之关联》，《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张兆凯：《朱元璋重典惩贪得失新论》，《求索》2002年第4期；薛国中：《朱元璋的廉政建设——教育、监察、惩奖》，《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